

文史苑

(四)

- 郭沫若在虹口
- 沈体兰先生传略
- 爱国实业家项松茂之死
- 虹口东洋街之忆
- 王洪文督建战备监房真相
- 国防部二厅的派系之争
- 陈璧君在服刑中
- 茫茫台湾行

8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虹口区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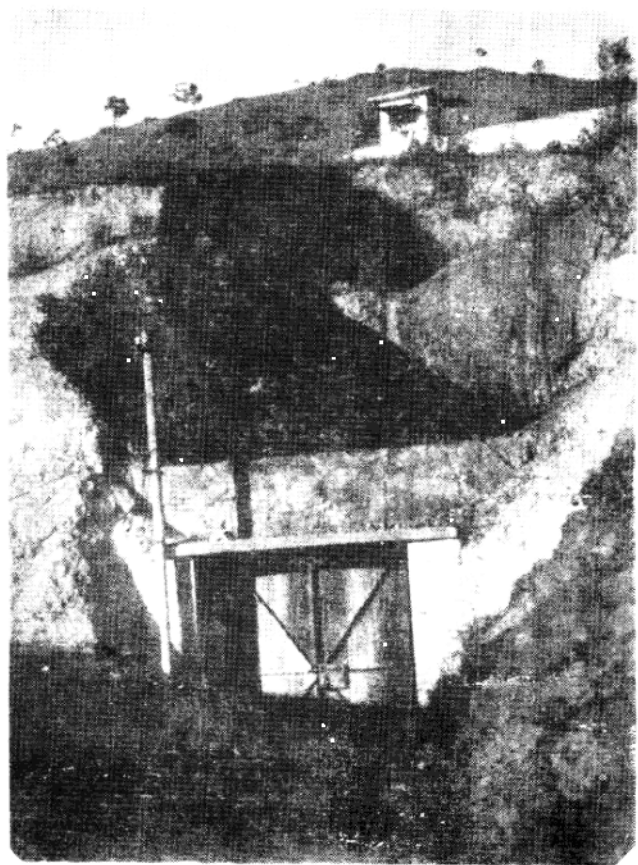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卷 头 语

(一)“左联”成立大会遗址究竟在何处？现已肯定不在多伦路145号而是多伦路201弄2号。本刊第一期《虹口区文化史话》中曾兼提两种不同说法，惜限于条件，未作深究。此事可供今后文物考证工作的借鉴。本刊第三集有关中共四大会址一文发表后，又得海外来信提供补充史料的线索（详见本集“海内外”栏）。我们希望《文史苑》的作者、读者也能对重要历史文物的考证作出努力。

(二)本刊第三集《从外国牢监说起》（刘邦云）、《将军在黎明前就义》（陈容）先后被《人民政协报》总550期、556期转载刊用；《一张珍贵的照片》（刘同葆）经《联合时报》总241期刊用。此外，本刊第一集的《鲁迅在虹口》（袁义勤），经《上海滩》89年9月号刊用；又香港《新晚报》、台湾《传记文学》先后刊用了丁芝的《聂耳当过班主任》、张令澳的《蒋介石与史迪威》等多篇文史稿。以上是我区政协文史资料被其他报刊转载、刊用的一部分，姑辑录如上，旨在继续策励我们的征集、编写工作。

——编者



帽子山工程外观（文见92页）

目 录

郭沫若在虹口	袁义勤 (1)
沈体兰先生传略	陈一鸣 陈承融 (7)
爱国实业家项松茂之死	项隆周 (15)
我所亲历的爱国学运	陈一心 (24)
忆原景林堂牧师江长川	任嘉尧 (29)
虹口“东洋街”之忆	杜绍文 (32)
——大租界中的小租界	
中正中学从创办到接管	赖纪云 (35)
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的成长	王文衡 (40)
——我的点滴记忆与体会	
记虹口区图书馆	本刊辑 (44)
驰名海内外的精武体育会	本刊辑 (48)
虹口的桥知多少	张志康 (51)
何世桢被诬投敌的前前后后	周 尚 (59)
抗战初中国空军的一次壮举	赵 朴 (63)
——忆驾机奇袭日本的副领队苏光华	
“国防部二厅”的派系之争	邱沈钧 郑良佐 (66)
戴笠的走私与“官倒”	张令澳 (76)
陈璧君在服刑中	刘 邦云 (85)

王洪文督建“战备监房”真相
——“四人帮”罪证之一
“地狱”去来

刘邦云 (92)

被人淡忘的老《时报》
陈冷血的时评
——报坛史话

朱 雯 (97)

义 勤 (106)

曹聚仁 (113)

漫谈“号外”
《大雷雨》的上演
——艺海忆旧

以 勤 (116)

钟 风 (119)

商务门市部的“开架”创举

顾祖荫 (121)

解放初期的上海煤炭市场
上海第一家国人自办的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

王志轩 (126)

刘同葆 (129)

虹口区农工党简况
虹口区九三学社简况

(132)

(134)

海内外
茫茫台湾行
旅泰归来

(137)

沈立行 (140)

杜绍文 (150)

郭沫若在虹口

袁义勤

隐居窦乐安路

“嗟我小斋中，灯火今复燃；
胸底生光明，深心知内观。
花开希望蕊，理智复能言；
景慕生之川，景慕生之源。”

这是浮士德作了复活节的春游，由原野回到书斋后，所唱出的诗句。

在一个深秋，郭沫若同志以被通缉的亡命之身，隐居在虹口窦乐安路（今多伦路）的一间亭子间里，整理完毕了他的《浮士德》诗剧（第一部）旧译稿。欣赏着自己的译文，感到上面这几句诗，完全写出了他当时从战场的驰骋中回到房间里的心境：“生活虽然受着限制，希望是非常葱茏的。”他甚至这样说：“我在这几句译文中所含孕的感情，比歌德写下它们时是还要丰富些的。”

大革命失败后，他于1927年10月下旬，从香港回到上海。一家人赁居在窦乐安路一楼一底小弄堂房子里，四邻大都是日本人。怀着“葱茏”的希望，他写过一些文章，用“麦克昂”为名发表。据他解释，“麦克”是英文maker（作者）的音译，“昂”是我。“麦克昂”的取意，就是“作者是我”。

当时，创造社的出版部设在北四川路麦拿里（今麦丰里），他曾经为该社拟定了一个发展计划。其中有一点是恢复《创造周报》。他听到鲁迅先生已由广州移居上海，便通过郑伯奇与蒋光慈的活动，邀请鲁迅合作。在报章上刊登恢复《创造周报》启事时，以鲁迅的名字领衔，麦克昂名列第二，再次是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等。不料其时，成仿吾正在日本，与李初黎、彭康、冯乃超等一批“少壮派”，另订了一个新计划，要把创造社作“明朗的思想战的基地”。彼此未通气，两个计划不接头，“日本的火碰到了上海的水”。成仿吾这一派回国后，反对恢复《创造周报》，对于跟鲁迅合作，也表示冷淡。为了避免可能的分裂，也考虑到自己不久即将出国，郭沫若便放弃原来的主张。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而我的退让，就表现在专心整理《浮士德》的那个时间。”

失掉去苏联的机会

出国，是全家去苏联。那是他在回上海后不久就决定的，但是行期却久久未能定。一直到这一年12月初旬，中苏邦交已经不绝如缕，在上海的最后一条苏联船就要开航了。在这整装待发的时刻，他却病倒了，染上了斑疹伤寒。40度的高热，要进医院，但不能公开，只好偷偷地住进北四川路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住了将近4个星期，回家疗养时，是手脚并用爬上楼的。生命终于保存下来，但是损失重大。两耳几乎完全失去听觉，这还是小事，失掉了去苏联的机会，这是严重的。正如他在回忆中所谈：“一个偶然的因素，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一世，甚至于一家一族。我时常在这样作想，假使我不发病，我当然决不会有此后十年间陷在日本的

局促的生活。”

苏联去不成，只有去日本。郭沫若同志当时的行止，是得到组织上关怀的。在1928年1月至2月他的日记中，留下了一些有关史料。正月19日日记：“中午将近时，民治（按：即李一氓同志）来，交来豪兄（按：周恩来同志当时化名伍豪）答函。”2月9日日记：“豪兄不来，一时也不能动身。恐怕11号不一定能走成。……”2月10日日记：“豪和民治来，同吃中饭。”

去神户的船期是2月24日，买船票时，化名吴诚，说是南昌大学教授，往东京考察教育。尽管凡事谨慎，2月23日晚上，还是起了风波。有消息说，龙华司令部已探悉了赛乐安路的住址，当晚要来拿人。郭沫若急忙跑到内山书店，由内山完造把他引到日本人开的八代旅馆寄宿一宵。第二天，他在汇山码头上船时，送行的人也就是内山老板一人。从此，他开始了十年东渡的流亡生活。

文化人聚会之所

郭沫若同志第二次寓居虹口，是在抗战胜利后。

1946年5月上旬，他和梁漱溟、章伯钧同机离渝。抵沪后，谢思洁（四川丝业公司经理）刚为他在狄司威路（今溧阳路）719号顶下一幢房子，是两层楼，有小花园。据吉少甫同志谈，当时因房屋内部须稍作整修，郭老一家人曾暂住施高塔路（今山阴路）恒丰里77号群益出版社，不久即迁入新居。

抵沪之初，文化界朋友纷纷为他洗尘，更多的是向他约稿。范泉同志其时主编《文艺春秋》，《峨嵋山下》等文即在该刊发表。在他的记忆中，郭老酒量颇洪，熊佛西、洪深尚

能应付，矛盾则招架不住。正象重庆天官府时一样，狄思威路719号也是“座上客常满”，是文化人聚会之所。在这里，也接待过不少文艺青年。他曾经应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之邀，出席假座育才中学举行的文艺晚会，作了题为《科学与文艺》的报告。丁景唐同志曾对笔者谈起郭老关心文艺青年的轶事。中学生赵汎，是一位无名诗人，病危时遗言托丁转恳郭老写一墓碑。于是，丁以“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名义写信，为一个陌生的不知名的青年提出这项要求。郭老立即挥毫，写了“赵汎之墓”四个大字。

在繁忙之中，郭沫若同志还担任了《文汇报》副刊《新文艺》与《新思潮》的主编。在《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中，说明了该刊的宗旨，是以人民至上的意识为意识，并申明这小小的园地是以培养新作家为重要任务。又在《春天的信号——“新思潮”解题》一文中，用散文诗的形式，阐明《新思潮》的主旨。当时《文汇报》进行全面改革，这是新增辟的六大周刊中的两种周刊，对青年读者影响颇大。

对鲁迅的怀念

他重寓虹口的第一年，正是鲁迅逝世十周年。二十年前，他们两人曾同时居住虹口，窦乐安路与景云里相距咫尺，但他和鲁迅竟是缘悭一面，因为他匆忙东渡了。抗战胜利后，郭沫若来沪不久，即与许广平、冯乃超、周信芳、于伶等人同赴虹桥万国公墓祭扫鲁迅墓。这一段时间里，他屡次在文章中阐述鲁迅精神的伟大之处。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他指出两人有着“不能混淆的断然不同的大节所在之处”。“鲁迅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进展，并且领导了时代的前进；而王国维却中止在一个阶段上，竟成为时代的“牺

牲”。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完成”；王国维好象是“一个伟大的未成品”。在《冷与甘》杂文中谈鲁迅精神，认为“怒”加“忍”，等于鲁迅的“冷”，表现了鲁迅精神反抗的一面；而“爱”加“诚”等于鲁迅的“甘”，表现了鲁迅精神的另一面。他还在《再论郁达夫》一文中，认为“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郁达夫的卑己自牧”，是“文坛上的三绝”。在《鲁迅和我们同在》这篇文章中，更是大声疾呼，号召大家坚持鲁迅的“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对于反人民的恶势力死不妥协的方向。”

我是……第三厅厅长

面对着当时严峻的国内形势，郭沫若同志发表的许多讲演与文章，都是围绕着“要民主，反内战”这个主题。为了悼念李公朴、闻一多，他连续写了几篇：《让公朴永远抱着一个孩子》、《悼闻一多》、《等于打死了林肯、罗斯福》。鼓动人民学习李、闻，“坚决扑灭法西斯瘟疫！”他发表演讲，常常是在特务窥伺的险境中进行的。一次，他出席上海文艺界在光华大戏院举行的普希金逝世110周年纪念会，讲词中号召大家“要象普希金那样反对专制暴政”。据戈宝权回忆，这天“国民党特务来包围剧院，准备要打进来。我们把戏院的铁门紧紧关上，在后台作了布置，必要时好让郭老从后台逃走。”在劝工大楼事件中，永安公司店员梁仁达被特务打死，其时郭沫若就是在参加大会的职工群众掩护下，从后台避走脱险的。第二天，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向记者发表谈话，对梁仁达遗属表示“吊唁”。郭沫若同志特为发表了诗《这个就叫最民主》，记述了这次暴行，并讽刺了吴国桢假作慈悲相。

有一次，他对陶行知半开玩笑地说：“你是黑榜状元，应该留意呢。”陶也半开玩笑地说：“不是状元是探花，是黑榜探花。你也准定榜上有名的。”他们对国民党的暗杀恐怖手段，一直是蔑视的。另一次，一位相熟的记者，劝郭老出入时要保持警惕，因为虹口一带特务活动特别多。郭老听了大笑说：“他们不敢！你忘了？我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蒋委员长下过委任状的。”这位记者认真地说：“那是抗战初期的事呀！”郭老认真地笑着回答：“可是他也没有收回委任状呀！”就这样，他虽身临险境，总是泰然处之。

1947年5月，解放战争日益发展，上海《文汇报》、《联合晚报》与《新民晚报》同时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到了这年10月下旬，民主同盟又被解散。为了保存力量，许多民主人士从上海转移至香港。郭沫若同志也于1947年11月中旬乘轮赴港。在离沪前夕，曾作七律一首《再用鲁迅韵书怀》：

“成仁有志此其时，效死犹欣鬓未丝。

五十六年余鲠骨，八千里路赴云旗。

讴歌土地翻身日，创造工农革命诗。

北极不移先导在，长风浩荡送征衣。”

这首诗抒发了他踏上征途前的革命情怀。

沈体兰先生传略

陈一鸣 陈承融

沈体兰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数十年生涯中，尽瘁于进步的教育事业，为抗日救亡运动和争取人民民主的伟大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89年是他诞辰90周年，特作此文，以表达我们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从事基督教学生运动

沈体兰先生又名流芬，1899年元月28日出生于江苏吴县周庄镇。父亲沈根黄，曾长期担任当地小学校长职务。

1922年夏，先生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获理学士学位。在学生时代，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受到新思潮的洗礼，对民主和科学心向往之。在大学里，担任学生会重要职务，并担任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会长，参加各种社会的和校际的活动，是个活跃分子。大学毕业前夕，被选派赴北平参加“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召开的大会，在那里接受了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聘请。

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就任青年协会学校组干事之职，经常到全国各教会办的大、中学去作巡回访问和讲演，锻炼了他的办事能力、交友才干和口才。这时他结识了燕京大学学生曹亮，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成为挚友。曹由先生推荐也就任青年协会学校组干事。在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下，他们怀着反帝爱国、改革社会的共同信念，倡导进步的基督教

学生运动，并与吴耀宗等在南京集会共同发起组织“基督教学生运动筹委会”，提出在宗旨中增加“实行革命谋求群众生活的解放与发展”这一条，以适应中国的国情和时代潮流。此举虽遭基督教上层保守势力的反对，但获得了教会学校中爱国青年学生的共鸣，从而使先生在基督教界青年一代中声誉鹊起。

1928年，先生赴英国留学，在牛津大学教育研究所读研究生，从此奠定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的志向。同年，代表青年协会出席在印度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议，在会上发表了抗日救国的演讲，抵制了外国传教士宣扬的不抵抗主义，受到与会者的瞩目。

1928—1930年间，先生先后认识中共党员浦化人和中共党员、作家胡也频，他们向他介绍了中国民主革命和党的政策，共同讨论了抗日救亡等问题，使先生深受启发，为其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此期间，先生用英文写作《新中国黎明》在印度马德拉斯大学发表，《英国中等教育制度》在英国牛津大学发表，《中国教育之改造》在基督教协进会出版。其中《中国教育之改造》一文发表后，受到中外教育界人士的重视，当时英国伦敦会主办的上海麦伦中学的英籍顾问白约翰（John S. Barr）对此颇为赞赏，适值是该校校长夏晋麟博士即将离职，遂共同商定推荐先生继任，此举正遂先生从事教育工作之初衷，决定接受聘任。

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先生激于爱国义愤和革命热情，不但同情和支持麦伦学生在九一八和一二九运动中的各项爱国救亡运动，而且亲自投身、积极参

加。在此期间，先生先后发起组织和参加的爱国社团有：①与爱国人士胡咏麒、吴耀宗、张宗龄等发起组织的“时事座谈会”；②与曹亮、李公朴等共同发起组织的“时社”；③青年会组织的“救国十人团”；④与阎宝航共同发起的“东北社”。并与刘湛恩、刘良模等28位基督教界著名人士联合发表支持一二九运动的《对时局的宣言》，以“中华基督教学生运动全国总会”常委、顾问身份，共同发表决议《我们的呼声》。先生经常发表演讲、剖析形势，旗帜鲜明地宣传团结御侮的救国主张。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先生为抗日救亡所作的努力更是不遗余力。“上海战时普及教育服务团”成立，担任九人理事之一；参加协调上海抗日救国运动的九人核心聚会；为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组织一个小型座谈会，请其介绍访问西北苏区的见闻，此举使上海爱国人士首次了解中共的主张，鼓舞了上海人民坚持抗战的斗志；参加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为争取国际上对我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而出力；参加路易·艾黎发起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国际委员会，任副主席。

1938年11月，先生趁代表基督教协进会出席在印度召开的“国际宣教协会”扩大会议之机，受宋庆龄的委托，代表“保卫中国大同盟”，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以及进步人士举行座谈。旋即赴英国伦敦参加了“人民之友”社的座谈会，并在英国各地考察教育。次年春天，转赴美国，应邀在中国留学生夏令营上作讲演，并会见美国各界进步人士。在这短短的半年中，先生作为中国人民的使者，奔波跋涉，在印、英、美等国宣传我国抗日斗争，扩大了反侵略正义事业的影响，为争取国际上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作出了贡献。

尽瘁进步的教育事业

1931年9月，先生应聘麦伦中学任教务主任、代理校长，翌年正式就任校长之职。在此之前，他曾得到中共党员王任叔的鼓励，发挥其热爱青年、擅长教育的特长，决心把麦伦办成一个爱国、民主、进步的教育基地。

先生聘请挚友曹亮为教务主任、富有活动能力的张以藩为训育主任、办事干练的陈其德为事务主任，对学校进行一系列革新：制定新型的办学方针，以“建设高尚思想、养成社会意识、练习集体意识、实行公众服务”为原则，重视思想品德教育和全面发展的培养，充分发挥青年的自觉创造精神，开展课外活动，建立师生合作民主办校制度；聘请了作家魏金枝等一批著名教师任教，并定期邀请众多进步人士来校讲演，创办了民众夜校、补习学校和义务学校，供学生实践锻炼，成为社会教育的实验基地。不数年，使学校发生了深刻变化，声誉日隆，成为上海为数不多的进步学校之一。不少文化知识界的知名人士纷纷把子女送到麦伦来上学，如田汉、钱亦石、李公朴、陈鹤琴、张宗龄以及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等。

为了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在先生主持下，1934年建造了室内体育馆，为当时上海各中等学校中所仅见。1936年又建成一幢设备完善的教学大楼，设有大讲堂、理化生物实验室和仪器室、10个教室。为了弥补经费不足，先生发起大规模募捐运动，并率先将先父的遗产三千元全部捐出，其捐资兴学的义举深获全校师生和社会的好评。其后先生在1951年离职时，学校为了表彰先生为学校所作的巨大贡献，将该楼改名为“体兰馆”，以志永久的纪念。

抗战军兴，麦伦校舍沦于敌手，学校迁入租界继续办学，在艰难的条件下，学校两度迁涉，最后租赁沪西武定路一幢楼房为临时校舍，坚持办学，先生为麦伦奔走擘划，殚精竭虑，备极艰辛。

国军西撤，上海沦为孤岛，形势险恶。先生通过王任叔同志的介绍，认识中共驻沪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和中共党员、著名学者梅益等，经他们推荐，自1938年后，不避艰险，先后聘任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校任教，其中有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化名林庚汉）、上海文委唐守愚（化名唐紫萍），关健夫、朱泽甫、林淡秋、楼适夷、盛震叔、冯宾符、赵朴初等人。他们以渊博的学识和进步的世界观，在课堂内外对学生进行教育，从而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充分显示了先生的胆略和远见卓识。

坚强不屈的民主斗士

由于上海局势进一步恶化，先生于1941年春辞去麦伦校长职务转赴内地办学，到广东韶关就任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之职，继而代理校长，后随校迁到重庆。1944年应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之邀，到成都任该校教授兼秘书长。抗战胜利前后，在燕大支持学生争取民主的斗争，担任成都市大学教授联合会和各界争取民主运动的领导，在社会上形成一支坚强的民主力量，先生那种为争取民主义无反顾和坚定不屈的精神，受到广大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的爱戴。

抗战胜利后，麦伦董事会决定聘请先生重返学校担任校长，遂于1946年8月返沪复职，同时兼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之职。从这时到1948年底的两年多时间里，先生为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争取和平、争取民主的正义斗争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是年9月，先生与张志让教授联系数位进步教授，发起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在先生的主持下，并得到中共地下文委李正文、唐守愚的支持，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斗争，在上海各界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影响深远的重大作用。

“大教联”成立后，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发起组织“美军退出中国月”，由先生主持外国记者招待会，发表英文演讲，全文刊载于各英文报刊上；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召开伪国大、与美国签订“中美商约”，“大教联”均发表宣言表示反对；与马寅初、孙起孟等发起成立“上海市教育界人权保障会”；与张志让等9位教授会见市长吴国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参加28位民主教授发表的意见书，提出反对内战、反对逮捕学生等六项抗议；美国特使魏德迈来沪召开所谓“民意调查”座谈会，先生代表各界人民，在会上对其谬论进行批驳；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沪发表为美国政策和国民党辩护的谈话，先生在会上义正词严地进行批驳和质询。在1948年中，上海学生为反迫害、反饥饿以及反美扶日举行多次示威游行，罢课罢教，“大教联”均站在学生一边，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

凡此种种，无不招致国民党当局的忌恨，1948年底，国民党终于采取了秘密大搜捕。为了躲避特务抓人，先生在上海处于最危急的时刻，被迫躲进《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国际友人鲍威尔家中避难一周，这位美国友人为他作了掩护。

受人尊敬的青年导师

先生重新担任麦伦中学校长后，聘请著名学者邱汉生、吴逸民等来校任教，并聘请中共地下党员马健行、刘菱芬、